

道德困境决策中的忽略偏差:现象与测量*

薛 宏^{1,2,3}, 李成立^{1,3}, 陈佳莉^{1,3}, 徐科朋^{1,2,3}, 张姝玥^{1,2,3}

(1.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心理学系, 桂林 541004; 2. 广西高校认知神经与应用心理重点实验室, 桂林 541004;
3. 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西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桂林 541004)

摘 要:道德困境决策中的忽略偏差效应是指在道德困境中,当作为和不作为都会造成消极结果的情况下,个体认为作为导致的消极结果比不作为导致的消极结果更不道德,从而使人们在道德决策时更倾向于不作为的现象。由于传统道德决策研究范式存在义务论决策倾向性和一般性不作为反应倾向相混淆的局限,道德困境决策中的忽略偏差效应尚未做进一步探索。本文梳理了道德困境决策中忽略偏差效应的表现,通过 CNI 模型提出甄别和测量道德困境决策中忽略偏差效应的策略:创设研究情景;分离不作为倾向性和忽略偏差效应;综合探索忽略偏差效应的群体和个体特征。针对 CNI 模型的局限性,结合 CAN 算法和漂移扩散模型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忽略偏差效应;道德判断;道德决策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2)06–0483–07

1 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的疫苗接种率低于正常预期,针对这一奇怪现象研究者发现,当接种疫苗本身可能导致死亡时,人们不愿给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即使因接种疫苗导致死亡的可能性远低于因流行病死亡的可能性(Ritov & Baron, 1990)。在当今全球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这种忽略偏差效应也仍然存在,人们依然会担心疫苗风险而选择不接种疫苗(Halpern et al., 2020)。忽略偏差效应(omission bias effect)是指面临作为还是不作为的两难情境时,当作为和不作为都会造成消极结果的情况下,人们会认为作为造成的消极结果比不作为造成的消极结果更应该受到谴责或更难以接受,从而在做决策时更倾向于不作为(Yeung et al., 2021)。忽略偏差效应在许多决策情境都有所体现,Blumenthal – Barby 和 Krieger(2015)发现忽略偏差是医疗决策中常见的认知偏差,这种偏差不仅仅会影响医生的决策也会影响患者的决策,表现为在非必要的情况下,医生和患者常常愿意维持现状而不是接受治疗;在法律领域中,故意杀人要比过失判罚更为严重,他们的区别之一是作为更能突出行为者的犯罪意图;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制定上也会受到忽略偏差效应的影响,例如,一些国家禁止主动安乐死但是允许被动安乐死,两者的差异就在于人们认为不作为(被动安乐死)比作为(主动安乐死)从心理上更容易被接受

(Sareen, 2019)。

在决策过程中个体的不作为偏向原因主要有忽略偏差效应、现状偏差、默认效应。现状偏差(status quo bias)是指个体决策时倾向于保持当前或以前选择的现象(Samuelson & Zeckhauser, 1988);默认效应(default effect)是指当存在默认选项时个体决策倾向于保留默认选项而不做出改变的一种现象。现状偏差与默认效应是一种行为惯性,前者聚焦于决策前后一致性,后者聚焦与已存在的默认选项保持一致性,这两者与忽略偏差解释不作为偏向机制的角度不同,忽略偏差更强调经过权衡后的决策忽略。同时,默认效应与忽略偏差的区别还在于忽略偏差更加重视决策带来的损失,而默认效应包含了同时考虑收益和损失(黄宝珍等, 2011);Ritov 和 Baron (1992)认为现状偏差是忽略偏差的延伸,二者的区别在于不作为时现状是否会发生改变。

电车困境和天桥困境是研究道德决策的传统范式,电车困境中,一辆飞驰而来的电车前方有五个被困的人,此时你可以扳动拉杆改变电车的轨道,避免撞死这五个人,但是轨道的另一边有一个被困的人,改变电车行驶轨道就会牺牲另一个人,此时你会如何选择(Foot, 1967)? 天桥困境中,在桥上,你可以在推下一个体重足够大的人阻止一辆前行的列车,列车的前方有五个被困的人,你会不会推下一个人从而救下五个人? 在道德困境决策中的不作为,即

* 基金项目:广西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重点项目(2021MJZD001)、(2022MJZD002),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JGY2021021)。

通讯作者:张姝玥, E-mail: shuyuezh@126.com。

不拉动拉杆或者不推下天桥上的人常常被认为是义务论决策倾向的结果,因为个体在道德困境中表现出的不作为是因为决策者遵守了规范。Crone 和 Laham(2017)认为在道德困境决策中,决策者除了功利主义决策倾向、义务论决策倾向以外还存在一般性不作为决策倾向,而这种不作为决策倾向并不是义务论决策倾向性,但其背后的原因并未做进一步的探讨。事实上,在道德困境决策中,决策者无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结果都是消极的并改变了现状,相比原情境,决策后的情境都出现了死亡或伤害,因此在道德困境中决策者的不作为就会受到忽视偏差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 CNI 模型、CAN 算法、漂移扩散模型探究在道德困境决策中的忽略偏差效应。

2 道德领域中忽略偏差效应的现象

道德领域中存在忽略偏差效应,被探讨的也非常广泛,人们认为作为导致的伤害要比不作为导致的伤害更不道德。Spranca 等(1991)通过实验探究了道德判断中存在的忽略偏差效应。实验材料为两则道德情境故事,网球比赛情境和目击者情境:

网球比赛情境(部分):约翰和伊万在网球比赛决赛中相遇,决赛前两人共进晚餐,伊万对辣椒过敏,约翰知道伊万吃了含有辣椒的招牌调味料就会胃痛,他就可以赢得第二天的比赛,服务员问他们需要什么调味料?而伊万觉得招牌调味料肯定不含辣椒。(1)约翰建议伊万尝试一下招牌调味料,最终约翰赢得了比赛。(2)伊万点了招牌调味料,而约翰没有提醒伊万招牌调味料含有辣椒,最终约翰赢得了比赛。

要求被试对材料中的人物的行为进行道德判断,并要求他们说出他们判断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被试普遍认为作为导致的伤害比不作为导致的伤害更不道德,而被试对自己这样判断的共同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对行为者意图的感知,被试认为作为导致的伤害更能体现出行为者不道德行为的意图;二是作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联,作为与消极结果之间的因果关联更强;三是责任,当行为人的社会角色对某事负有责任时,作为导致的伤害比不作为更不道德。Jamison 等(2020)复刻并拓展了 Spranca 等(1991)的研究内容,实验材料同样为网球比赛情境和目击者情境,他们验证了意图、因果关联、责任和后悔情绪引发的忽略偏差效应。研究结果同样验证了在道德判断中忽略偏差效应的存在,即人们认

为作为导致的消极结果比不作为导致的消极结果更不道德;意图、因果关联、责任这些因素与人们对情境中行为人作为导致消极结果的道德评分呈正相关,但是后悔情绪与之呈负相关,这与之前的研究的结论不同。可能的一个解释是道德情感具有调节人们道德行为的作用,如果一个人做了不道德的事情,那么人们可能会觉得他缺乏后悔这样的道德情感。

当人们进行道德判断时,虽然作为、不作为都会引起伤害,但人们认为作为引起的伤害比不作为更加不道德(Cushman et al., 2006; Henne et al., 2019; Jamison et al., 2020; Spranca et al., 1991),这种认知导致人们在道德困境中倾向于不作为。由于人类天生就有根深蒂固的对伤害他人的厌恶(Haidt & Joseph, 2004),在思考道德困境时会产生反射性的强烈的厌恶情绪(Miller & Cushman, 2013)。因此许多哲学家提出了一个更普遍的主张,即主动伤害别人比被动地对他人造成伤害在道德上更难以让人接受(Foot, 1985; Moore, 2009),Ritov 和 Baron(1990)采用风险平衡程序^①发现了道德困境决策中的忽略偏差效应,但是该方法遭到了一些研究者的质疑,Connolly 和 Reb(2012)认为这种方法并不符合现实的决策情境,道德困境决策反映出的忽略偏差效应尚未进一步有所研究的原因主要在于研究范式的局限性:传统道德两难困境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往往需要采取行动,例如推下一个人或者拉动操纵杆,因此传统道德困境混淆了个体一般性作为决策偏好和功利主义决策偏好,以及一般性不作为决策偏好和义务论决策偏好(Crone & Laham, 2017)。Yeung 等(2021)认为应该将像电车困境这样的道德困境和忽略偏差的研究相区分,他们认为这类困境往往是结果不对等的,作为和不作为导致的结果不能以客观的标准衡量,即少数的牺牲+遵守规范的决策和多数数的牺牲+违反规范的决策很难平衡是否对等。

忽略偏差效应表现为决策时“作为-不作为”的不对称,即当作为和不作为都会导致消极结果的情况下,人们更加倾向于不作为的现象。以往的研究在许多领域都发现了忽略偏差效应的存在,道德决策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类似经济决策中,决策者可以根据收益和损失作为自己决策的参考,在决策时的不作为是一种谋求更多利益或者将损失降到最低的决策选择。而人们的道德决策与他们自身的道

^① 风险平衡程序是指实验者只提供不作为导致伤害的概率,并询问参与者采取行动的的概率,这种方法用概率反映参与者可能的行动。该程序不符合实际决策情境,会导致参与者忽视两种选择的现实后果。

德判断相关,当考虑到道德因素时,决策的合理性就会变得更为复杂,道德作为受保护的价值(Protected Values, PVs)拒绝与其他任何价值相互交易,尤其拒绝与经济价值进行交易,例如有些人认为无论经济利益有多大,都不可以做违反道德的事(Baron & Ritov, 2009; 何贵兵, 奚岩, 2005)。在传统道德困境决策中,相较于默认效应和现状偏差,忽略偏差更契合 Crone 和 Laham(2017)提出的道德决策可能存在的一般性不作为反应偏好,但是想要准确甄别与测量在道德困境决策中的忽略偏差效应,需要克服传统道德决策研究范式存在的局限性。

3 道德困境决策中忽略偏差效应的甄别与测量

电车困境和天桥困境无论是在伦理学还是在心理学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当个体做出牺牲一个人救下五个人的决策时,他就被认为是功利主义驱动的个体,因为他做出了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当个体什么都不做,牺牲五个人则被认为是义务论驱动的个体,即使没有救下更多的人,但他遵守了“不主动伤害”的规范。无论决策者作为还是不作为,结果都是消极的并且现状都发生了改变,即个体在道德两难困境中的不作为决策会受到了忽略偏差效应的影响。如果想要甄别道德困境决策中的忽略偏差效应,首先需解决在道德困境中道义论决策倾向与不作为决策倾向混淆的问题,这可以利用 CNI 模型分离不作为倾向、道德规范敏感性。随后在此基础上测量忽略偏差效应。

3.1 CNI 模型

针对传统道德两难困境研究范式的局限性 Gawronski 等(2017)开发了 CNI 模型,该模型利用多项式加工树模型(multinomial processing tree, MPT)分离并且量化在道德困境中个体对结果的敏感性(C 参数)、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N 参数)和不作为的敏感性(I 参数)。每个参数是在 0 到 1 变化的值,C 参数显著大于 0 表明决策受到结果的影响,N 参数显著大于 0 表明决策受到规范的影响,I 参数显著大于 0.5 表明一般性不作为偏好,显著低于 0.5 表明一般性作为偏好(1 - I),量化的方法见(Gawronski et al., 2017; Komer et al., 2020)。

Gawronski 等(2017)对传统道德两难困境进行了操纵,分离出了群体层面作为和不作为的敏感性,Baron 和 Goodwin(2019)认为当作为 - 不作为的区别不受功利主义决策和义务论决策影响时,他们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这种在群体层面的不作为反应倾向其实质可能反映了道德困境决策中的忽略偏差效应,但 CNI 模型没能区分一般性不作为倾向

性和忽略偏差效应,仅仅把个体在道德困境中的不作为倾向性当作是一种决策倾向,未对其背后的原因做进一步的探究。此外, CNI 模型的一个局限性在于,它只能拟合群体层面的三个参数,不能在个体层面拟合出可靠的决策参数,因此不能进一步地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曾笑雨, 马焱娜, 2020; 徐科朋等, 2020)。Komer 等(2020)拓展了 CNI 模型的困境数量,将原来的 24 个道德情境拓展到了 48 个,使之可以量化个体层面的可靠的三个参数,但是要想探究道德决策中的忽略偏差效应, CNI 模型依然存在一个局限性: CNI 模型中对道德困境操纵后的四种类型:(1)规范允许、利益大于成本(2)规范允许、利益小于成本(3)规范禁止、利益大于成本(4)规范禁止、利益小于成本,依旧难以客观地平衡决策的结果。

3.2 甄别与测量的方法策略

Gawronski 等(2017)的 CNI 模型对道德两难困境的操纵使得我们可以关注道德两难困境中除了功利主义决策和义务论决策之外的作为倾向性和不作为倾向性。而这种反映在群体层面的不作为倾向性则可能是忽略偏差效应的表现,我们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步骤进行探索。

首先,创设研究情境。传统道德决策研究范式混淆了功利主义倾向性和一般性作为倾向性以及义务论倾向性和一般性不作为倾向性,虽然 CNI 模型对道德困境进行了相应改良,分离出了个体在道德决策中功利主义倾向性、义务论倾向性、不作为倾向性,但是改良后的情境依旧是决策结果难以对等的道德情境。创建评估作为/不作为反应决策区别最好的方法是使用规范不支持任何选择且结果一样的情境(Baron et al., 2021),因此,需要创建一个只能够反映决策者作为倾向性或者不作为倾向性的“等价情境”。在这个情境中确保作为和不作为都会产生等价的消极结果,以避免产生功利主义倾向与忽略偏差的混淆。还要保证规范的平等性,即作为和不作为在道德法律规范下都是等同的,以避免规范对个体决策的影响。被试需要在这样情境中做出作为还是不作为的二元对立决策,以此反映他们决策中的忽略偏差。

其次,分离不作为倾向性和忽略偏差效应。在道德两难困境中的不作为倾向性可能受到忽略偏差效应的影响,但是要想准确验证在道德决策中这种群体层面的不作为倾向性是否是忽略偏差效应,我们就需要量化每个被试在道德困境决策中不作为的倾向性,将他们在 CNI 道德决策型中的不作为倾向

性即 I 参数与“等价情境”中的不作为决策进行相关分析,从而区分忽略偏差效应和道德决策不作为倾向及确定两者关系。具体流程包括:第一步,被试在创建出的“等价情境”中做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决策,作为忽略偏差效应的指标;第二步,被试在 CNI 模型的 48 个道德困境中做出道德决策,这 48 个道德困境也是作为和不作为的二元对立决策,CNI 模型可以聚合出每个被试在道德决策中的 C 参数 N 参数和 I 参数。第三步,将第一步中被试不作为的决策与第二步中的 I 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如果相关性显著,则说明在群体层面上,CNI 道德决策模型中的不作为倾向受到了忽略偏差效应的影响。

最后,综合探索忽略偏差效应的群体和个体特征。虽然以往大量的关于忽略偏差效应的研究中都验证了忽略偏差效应涉及到广泛的领域以及忽略偏差效应的群体特征。但是忽略偏差效应并不普遍适用于所有的场景和所有的个体。例如,Olsen(2017)对荷兰人民的一项实验中发现,在政治领域中,当政治领导人不作为和作为都会导致消极结果时,人们对政治领导人主动作为的评价要比不作为的评价更加积极。对于这一发现,Olsen(2017)的解释是当国家形势恶化,政治领导人不采取行动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表现;Connolly 和 Reb(2003)发现当疫苗存在风险的情况下,部分人依旧愿意接种疫苗,即如果一个行为是正当的和符合社会期望的,那么采取行动的动机可能比不采取行动的动机更强烈,导致忽略偏差效应的消失(Bar - Eli et al., 2007; Baron & Ritov, 2004);在个人层面上,Chung 等(2014)认为可以用调节定向理论解释 Baron 和 Ritov(2004)发现的忽略偏差的个体差异。调节定向是一种动机机制,解释了人们为什么会表现出回避或者行动,每个人都有两种调节定向:促进定向和预防定向,促进定向是由成长需求引起的,关注的是收获而不是损失,预防定向是由安全需要引起的,关注损失而不是收获(Crowe & Higgins, 1997),研究结果表明忽略偏差效应只与预防定向特征的个体有显著的联系,与促进定向特征的个体无关。此外,在 CNI 模型中拟合出的 I 参数也只是被试总体上不作为的反应倾向,并不能说明忽略偏差效应在个体层面的普遍性。

4 不足与展望

4.1 道德困境决策中的反常反应的来源

在 CNI 模型中 I 参数需要对一些“反常反应”进行捕捉,“反常反应”是指决策者做出与研究假设相反的反应,例如:在规范允许并且利益大于成本的情境被试选择不作以及规范禁止、利益小于成本

的情境中选择作为(Baron & Goodwin, 2019)。根据本文的观点,道德困境决策中的忽略偏差效应与 I 参数有显著的关联。但是在 CNI 模型中这种不作为倾向性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忽略偏差效应产生的还需要对 CNI 模型中的道德困境做进一步的分析。Baron 和 Goodwin(2019)认为在 CNI 模型中个体的不作为反应倾向性应该理解成义务论反应的结果,而在 CNI 模型中的反常反应并不是由不作为反应倾向性引发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被试不同意研究者所创建的困境以及被试的注意力不集中所导致的。在道德困境决策中规范最基本的定义是“造成伤害的作为是不被允许的(*primum non nocere*)”,此外做与允许原则(*doing and allowing*)是指主动造成伤害要比允许伤害的发生更加糟糕,这两者都可以用来解释道德困境中的规范,而不作为的反应倾向应包含在义务论反应倾向内。

针对 Baron 和 Goodwin(2019)的批判,Gawronski 等(2020)回应道从表现上来看,义务论决策结果也表现为不作为,从哲学角度可以将一般性不作为倾向性归类为义务论决策,例如“做与允许”原则。但是 CNI 模型探究的是人们在道德困境中决策反应的心理机制,其目的是确定在行为水平上观察到的“刺激 - 反应”的结果,是否存在反常反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模型捕捉到的反应结果。Gawronski 等(2020)也强调 CNI 模型不对观察到的反应模式背后的心理过程做任何的假设,CNI 模型分离出的 I 参数也只提供了一个量化的可参考的参数。我们认为在道德困境中个体的一般性不作为反应偏好受到忽略偏差效应的影响,那么简单地将忽略偏差效应归类于义务论反应的结果并不能达到我们探究在道德困境中被试反应背后心理学效应的目的。但是 CNI 决策模型属于情境决策法,这类方法确实存在被试不同意研究者创建的情境而做出反常反应的问题,这就导致 I 参数的可靠性有所降低,因此在之后的研究中对 CNI 模型使用到的困境要做可靠性检验,而不是直接拿来使用尤其是在中文语境中;而被试粗心导致的不作为倾向性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尤其是拓展困境数量后的 CNI 模型,在开展相关研究时可以参考 Luke 等(2022)通过设置注意力检验排除粗心的被试。

4.2 CNI 模型与 CAN 算法

Baron 和 Goodwin(2019)对 CNI 模型的另一个主要批判是 CNI 模型序列加工的问题,他们认为这种加工方式与 Greene(2014);Greene 和 Haidt(2002)的双过程加工理论相冲突,该理论认为人们

的道德决策是功利主义决策和义务论决策相互竞争后的结果,而 CNI 模型假定决策者决策过程是按照 C-N-I 的序列加工过程。并且从计算结果上,Liu 和 Liao (2021) 认为这种序列加工会导致规范敏感性 N 参数被高估,使得一般性不作为反应偏好 I 参数不可靠。因此刘传军和廖江群 (2021) 在 CNI 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平行加工的计算方式提出的 CAN 算法也可以量化出个体层面的不作为倾向性。今后的一个目标在于通过这两种可以在道德困境中量化个体层面不作为倾向性的方法相互验证道德决策困境中的忽略偏差效应。

4.3 多项式加工树模型和漂移扩散模型

CNI 模型采用多项式加工树模型 (MPT),得到的数据仅取决于被试的响应概率,Baron 等 (2021) 认为这种模型可能并不适用于道德判断和道德决策,因为 MPT 假设在涉及冲突的情况下,决策者只关注一侧的选项,例如当功利主义决策与义务论决策相冲突,MPT 先关注结果,结果不驱动被试决策时才关注规范。在道德困境中,当某些决策原则非常明确时 MPT 是能够发挥作用的,例如杀死一个人才能获得救下另一个人,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可以快速反应杀死一个人是不被允许的。

另一种决策模型是漂移扩散模型 (Drift Diffusion Models, DDM) 它把决策描述为一个连续抽样的过程,即带有噪声的信息从起点累积到对应某一选项的边界或者阈值 (即标准),该选项将被选中 (Ratcliff & McKoon, 2008; 张银花等, 2020)。公式如下:

$$dy(t) = v(\Delta u) \cdot dt + \sigma \cdot dW$$

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可能反应的选项会积累力量,当积累的力量达到边界或者阈值时决策者会做出响应,相比于 MPT 该模型更适合后果和规范之间冲突的道德困境决策。当决策者思考在困境中如何决策时,两种反应都以一种随机但是可以预测的方式积累力量,当它们某一个选项积累的力量达到一个边界或者阈值时决策者将做出选择。因此,对于作为还是不作为决策的任何操纵都会体现在两种选择力量的差异上,这种差异反映在到达一侧或者另一侧边界的漂移率和响应时间上。道德困境中 DDM 可以通过作为和不作为选项的响应时间、漂移率差异以及相对于边界的起点偏差来观测和解释道德困境决策中作为/不作为决策之间的差别。Baron 等 (2021) 提出要想将 DDM 应用于道德判断和道德决策的一个难点在于需要收集每个被试足够的数据,这就对道德困境的编制和实验的操作有很高的

要求,要尽量地避免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练习效应。在探索道德困境中忽略偏差效应的策略小节中,我们创建了一个等价的情境,在这个情境中,被试做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二元对立决策以作为被试忽略偏差效应的“反应指标”,通过 DDM,可以将被试在道德困境决策中作为和不作为选项的响应时间、漂移率和起点偏移量与“反应指标”进行分析,综合探究道德困境中忽略偏差效应的特征。

5 结论

计算模型提供了一种通用的数学语言,可以用来比较不同道德认知研究的效果大小,随着计算模型在道德决策研究中的应用,使得我们对道德困境决策的研究也更进一步。CNI 模型采用多项式决策树模型分离出了道德决策中规范敏感性和一般性不作为敏感性,CAN 算法在 CNI 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平行加工的算法计算出在道德决策困境中被试的结果敏感性、规范敏感性和一般性作为敏感性,结合 CNI 模型、CAN 算法计算出的 I 参数与个体在“等价情境”中做出的不作为反应,验证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可以甄别和测量道德困境决策中存在的忽略偏差效应。相比于 CNI 模型,漂移扩散模型更加适合道德困境决策,漂移扩散模型提供的指标,例如决策响应时间、漂移率和起点偏移量,通过这些指标可以测量道德困境中决策中忽略偏差效应的特征,但是相比于 CNI 模型,漂移扩散模型不能分离出在道德困境中的义务论决策和一般性不作为反应偏好。因此,无论是 CNI 模型还是漂移扩散模型都具有自身的优势和局限性。此外,CNI 模型和漂移扩散模型都采用情境决策的方法,这类方法存在反常反应的问题,反常反应与研究使用的困境有很大的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预实验的方式验证困境的有效性,例如 Baron 和 Goodwin (2019) 的实验一,对每个困境设置了四个问题,用来测试困境的有效性。总之,对道德两难困境中存在的忽略偏差效应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忽略偏差效应的适用范围、验证忽略偏差效应的普适性,同时弥补之前道德决策研究忽略之处,甚至能够更进一步探究忽略偏差效应的内在心理机制。

参考文献

- 曾笑雨,马燮娜. (2020). 多项式模型在道德判断研究中的应用. *科学通报*, 65(19), 1912-1921.
- 何贵兵,奚岩. (2005). 保护性价值观及其对决策行为的影响. *应用心理学*, 11(1), 60-66.
- 黄宝珍,徐富明,王岚,马向阳,吴修良. (2011). 行为决策中

- 的默认效应. *心理科学进展*, 19(11), 1675 – 1683.
- 刘传军, 廖江群. (2021). 道德困境研究的范式沿革及其理论价值. *心理科学进展*, 29(8), 1508 – 1520.
- 马向阳, 徐富明, 吴修良, 黄宝珍, 黄雅凌. (2011). 行为决策中的忽略偏差: 心理机制与影响因素. *心理科学进展*, 19(12), 1834 – 1841.
- 徐科朋, 杨凌倩, 吴家虹, 薛宏, 张妹玥. (2020). CNI 模型在道德决策研究中的应用. *心理科学进展*, 28(12), 2102 – 2113.
- 张银花, 李红, 吴寅. (2020). 计算模型在道德认知研究中的应用. *心理科学进展*, 28(7), 1042 – 1055.
- Bar – Eli, M., Azar, O. H., Ritov, I., Keidar – Levin, Y., & Schein, G. (2007). Action bias among elite soccer goalkeepers: The case of penalty kicks.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8(5), 606 – 621.
- Baron, J., & Goodwin, G. P. (2019). Consequences, norms, and inaction: A comment.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15, 421 – 442.
- Baron, J., Goodwin, G. P. J. J., & Making, D. (2021). Consequences, norms, and inaction: Response to Gawronski et al. (2020).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16(2), 566 – 595.
- Baron, J., & Ritov, I. (2004). Omission bia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normalit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94(2), 74 – 85.
- Blumenthal – Barby, J. S., & Krieger, H. (2015). Cognitive biases and heuristics in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A critical review using a systematic search strategy.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35(4), 539 – 557.
- Chung, E. K., Kim, S. J., & Sohn, Y. W. (2014). Regulatory focus as a predictor of omission bias in moral judgment: Mediating role of anticipated regret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7(4), 302 – 311.
- Connolly, T., & Reb, J. (2003). Omission bias in vaccination decisions: Where's the "omission"? Where's the "bia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91(2), 186 – 202.
- Connolly, T., & Reb, J. (2012). Toward interactive, internet – based decision aid for vaccination decisions: Better information alone is not enough. *Vaccine*, 30(25), 3813 – 3818.
- Crone, D. L., & Laham, S. M. (2017). Utilitarian preferences or action preferences? De – confounding action and moral code in sacrificial dilemma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04, 476 – 481.
- Crowe, E., & Higgins, E. T. (1997). Regulatory focus and strategic inclinations: Promotion and prevention in decision – making.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69(2), 117 – 132.
- Cushman, F., Young, L., & Hauser, M. (2006). The role of conscious reasoning and intuition in moral judgment: Testing three principles of harm.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12), 1082 – 1089.
- Foot, P. (1967). The problem of abortion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double effect. *Oxford Review*, 5, 5 – 15.
- Foot, P. (1985). Utilitarianism and the virtues. *Mind*, 94(374), 196 – 209.
- Gawronski, B., Armstrong, J., Conway, P., Friesdorf, R., & Hutter, M. (2017). Consequences, norms, and generalized inaction in moral dilemmas: The CNI model of moral decision – mak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3(3), 343 – 376.
- Gawronski, B., Conway, P., Hütter, M., Luke, D. M., Armstrong, J., & Friesdorf, R. (2020). On the validity of the CNI model of moral decision – making: Reply to Baron and Goodwin (2020).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15(6), 1054 – 1072.
- Greene, J. (2014). *Moral tribes: Emotion, reason, and the gap between us and them*. Penguin.
- Greene, J., & Haidt, J. (2002). How (and where) does moral judgment work?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6(12), 517 – 523.
- Haidt, J., & Joseph, C. (2004). Intuitive ethics: How innately prepared intuitions generate culturally variable virtues. *Daedalus*, 133(4), 55 – 66.
- Halpern, S. D., Truog, R. D., & Miller, F. G. (2020). Cognitive bias and public health policy during the COVID – 19 pandemic. *Jama*, 324(4), 337 – 338.
- Henne, P., Niemi, L., Pinillos, A., De Brigard, F., & Knobe, J. (2019). A counterfactual explanation for the action effect in causal judgment. *Cognition*, 190, 157 – 164.
- Jamison, J., Yay, T., & Feldman, G. (2020). Action – inaction asymmetries in moral scenarios: Replication of the omission bias examining morality and blame with extensions linking to causality, intent, and regre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89, 103977.
- Korner, A., Deutsch, R., & Gawronski, B. (2020). Using the CNI model to investigat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moral dilemma judgmen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6(9), 1392 – 1407.
- Liu, C., & Liao, J. (2021). CAN algorithm: An individual level approach to identify consequence and norm sensitivities and overall action/inaction preferences in moral decision – making.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547916.
- Luke, D. M., Neumann, C. S., & Gawronski, B. (2022). Psychopathy and moral – dilemma judgment: An analysis using the four – factor model of psychopathy and the CNI model of moral decision – making.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3), 553 – 569.
- Miller, R., & Cushman, F. (2013). Aversive for me, wrong for you: First – person behavioral aversions underlie the moral condemnation of harm.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 Compass, 7(10), 707 – 718.
- Moore, M. S. (2009). *Caus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An essay in law, morals, and metaphys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Demand.
- Olsen, A. L. (2017). Responding to problems: Actions are rewarded, regardless of the outcome.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19(9), 1352 – 1364.
- Ratcliff, R., & McKoon, G. (2008). The diffusion decision model: Theory and data for two – choice decision tasks. *Neural Computation*, 20(4), 873 – 922.
- Ritov, I., & Baron, J. (1990). Reluctance to vaccinate: Omission bias and ambiguity.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3(4), 263 – 277.
- Ritov, I., & Baron, J. (1992). Status – quo and omission biases. *Journal of Risk Uncertainty*, 5(1), 49 – 61.
- Samuelson, W., & Zeckhauser, R. (1988). Status quo bias in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Risk Uncertainty*, 1(1), 7 – 59.
- Sareen, R. (2019). India decides on euthanasia: Is the debate over. *Health Care Current Reviews*, 7(3), 1 – 3.
- Spranca, M., Minsk, E., & Baron, J. (1991). Omission and commission in judgment and choi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7(1), 76 – 105.
- Yeung, S. K., Yay, T., Feldman, G. J. P., & Bulletin, S. P. (2021). Action and inaction in moral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Meta – analysis of omission bias omission – commission asymmetri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8(10), 1499 – 1515.

The Omission Bias in Moral Dilemma Decision – making: Phenomena and Measurement

Xue Hong^{1,2,3}, Li Chengli^{1,3}, Cheng Jiali^{1,3}, Xu Kepeng^{1,2,3}, Zhang Shuyue^{1,2,3}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aculty of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2. Guangxi College and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Psychology, Guilin 541004;

3. Ethnic Applied Educ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Guilin 541004)

Abstract: The omission bias effect in moral dilemma decision – making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that when both action and inaction cause negative results, individuals think that the negative results caused by action are more immoral than those caused by inaction, thus making people more inclined to inaction in moral decision – making.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ation that the traditional moral decision – making research paradigm has the confusion of deontological decision – making tendency and general inaction reaction tendency, the omission bias effect in moral dilemma decision – making has not been further explored. This paper sorted out the performance of omission bias effect in moral dilemma decision – making. Through the CNI model, we propose strategies to identify and measure the omission bias effect in moral dilemma decision – making: creating research scenarios; separating the tendency of inaction and omission bias effect;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of group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that omission bias effect. In view of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NI model, we combine CAN algorithm and drift diffusion models to forecast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Key words: omission bias effect; moral judgment; moral decision – making